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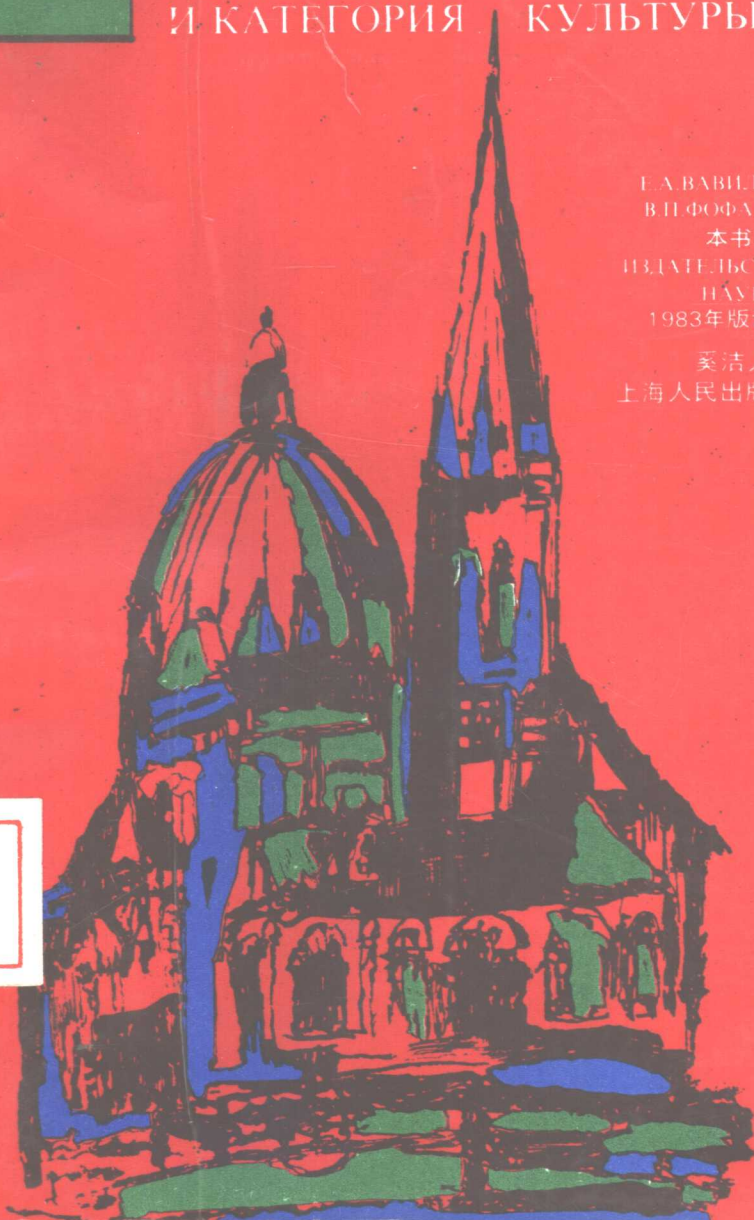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 文化范畴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КАТЕГ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Е.А. ВАВИЛОВ
В.П. ФОФАНОВ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3年版译出

奚洁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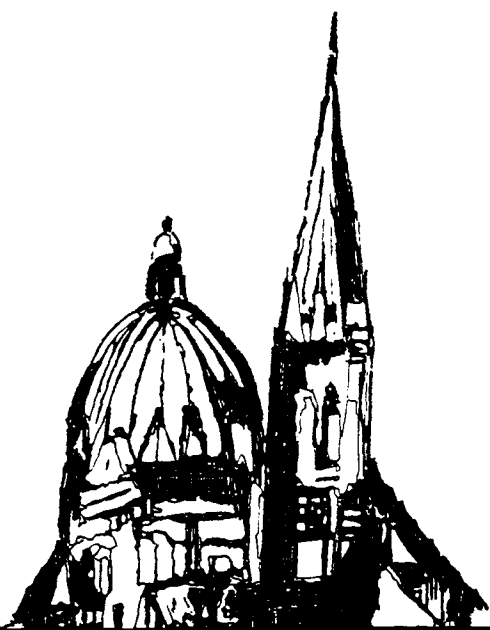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КАТЕГ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Е.А.ВАВИЛИН,
В.П.ФОФАНОВ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НАУКА 》
1983年版译出

奚洁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Е. А. ВАВИЛИН В. П. ФОФАН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КАТЕГ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杨承紘

封面装帧 诸焕庆

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

奚洁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25 插页2 字数 142 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1482-5/B·182

定价: 6.50元

译者前言

本书是80年代苏联学术界较具代表性并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学专著之一。作者E·A·瓦维林副博士和B·П·福法诺夫博士系新西伯利亚大学哲学教授。他们除合著本书以外，还分别著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知识范畴的文化》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社会活动》等重要著作。

本书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丰富的资料、特有的视角对苏联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哲学、文化学著作中关于文化范畴方面的各种理论观点，从理论方法论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批判性评析。作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原理以及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将文化范畴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加以考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方法论意义，颇具新意和特色。特别是本书在阐述文化范畴研究的认识论原则、文化范畴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等范畴及社会系统的抽象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显示出作者的功力和本书的理论深度。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特色在于：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高度，阐明了把文化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

在苏联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文化概念具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即价值论的、人类学的和社会精神生活论等三种观点。自6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传统的文化定义遭到批评。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原有的文化定义带有静止性和“对象中心论”的缺陷。所以,他们引进了“动态性”的概念,并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种新的基本看法,即“创造性活动论”和“活动方式论”。这些新观点意在强调,不但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且活动的过程及其方式本身也应该被列入文化的范围。本书作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指出,无论是传统的观点还是新的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它们都从区分出与文化有关的那个活动领域为重点,即都停留在讨论现实的什么方面应该被反映在文化概念中,而不考虑反映现实的方式。作者认为,仅仅从本体论方面来制定文化概念,也就意味着只把某些东西说成是文化。因此作者指出,虽然从本体论方面研究文化概念是必要的,它是理论上描述文化的前提,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既从本体论方面,又从认识论方面去研究文化,也就是不仅要指明那个被看作为文化的实在,而且还要揭示出‘文化’概念在某种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地位,要意识到文化在反映社会中的层次。”这一观点,无疑是对苏联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文化概念问题上“狭义”与“广义”之争的一种超越。联系到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定义的论争及其分歧的由来,也不能不给人一种富于启发性的、十分清新的感觉。

作者主张,就本体论方面而言,文化范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局部性的范畴,而是一般社会学的一个总体性的基本的范畴,它规定着历史过程的有机整体,也就是它把整个社会系统作为反映对象。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文化范畴的使命就是要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相当大的概括力。从它所固有的反映层次这一特定角度来看,文化范畴包括最广泛的社会领域,归根结蒂,包括整个社

会。”然而这样说，必然会产生“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的关系问题，似乎这两个概念会发生混淆或矛盾。作者认为这一表面看来矛盾的现象，实质上并不矛盾。只要对文化范畴进一步作认识论的研究，即弄清文化范畴是在何种理论层次上反映社会这一客体的，这个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

第二，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揭示了文化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认为，目前苏联文化学界对文化范畴缺乏统一的解释，其基本原因是文化学本身的不成熟，就其学科发展阶段来说，它还处于科学的前对象阶段。因此，为了使文化学研究能上升到科学的对象阶段，也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进一步系统化，必须把文化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阐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其他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一种成熟的、发展的理论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①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着重分析文化范畴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等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文化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指出，从方法论上说，如果既从本体论方面，又从认识论方面研究文化范畴，那么，必须使之同社会经济形态范畴相连接起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制定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的理论基础。而其他一些局部性的范畴，如价值、创造性活动等概念，虽然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它们来对文化进行描述，但是它们作为局部性的范畴不能作为制定文化范畴的基础。因此本书作者着力论述了文化范畴同社会经济形态及社会关系概念之间的联系。他们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最中心的范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畴，但它是最高一级的抽象概念；它虽然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着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但它决不包含着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全部丰富内容。因而，为了具体地描述现实的历史过程，可以而且必须引进一些派生的、中介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表现出不同社会的主要共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决定着它们的特征，即具体的历史的特殊性。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作者认为：“社会”这一术语可理解是指某种客观的现实，也就是没有进一步区别的社会客体。自然，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们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上加以反映。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对于“社会”这一整体的反映系统可以划分出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层次：首先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相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它所提供的是社会发展、运动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其次是各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学，例如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较具体的层次，这一层次上揭示的是比较一般的特殊规律，是一种相对具体的历史共性；再次是与文化范畴相联系的经验社会学层次，它是某种社会经济形态一定的、具体的历史存在形式，例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就是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某种具体的存在形式。

在书中，作者还通过强调深入研究“文化”同“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必要性，阐明了建立文化的系统概念的方法论。作者指出，文化范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系统的因子之一，同社会关系总和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只有把文化范畴与之相联系起来，把文化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具体存在方式，才能制定出关于文化的真正系统的概念。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系统抽象模式的一般概念，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基本因素，

借助于它去分析文化现象，就为在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基础上系统研究文化问题提供了可能。其次，“活动”是近几年来苏联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范畴之一。一些人认为，“活动”范畴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即是初始性范畴。本书原则上赞同上述观点，肯定了文化同“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在书中强调指出“社会关系这是主体活动的社会形式”，所以“脱离了社会关系，活动就不能存在”。因此，要深刻地阐明文化范畴的内涵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不能忽视社会关系概念。再次，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也说过某些对象是文化，但“对象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是简单地作为被客观化了的人的力量和才能的体现，而是作为活生生的活动和对象化了的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活动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的因素。”因此，“核心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社会关系，……不是对象本身。”最后，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社会活动主体本身也列为它的成分。然而，“人本身，它一方面是创造者，是社会关系的积极主体，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客体。因此，……人的积极性、主体性本身不能自由地脱离这些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客观表现。”

第三，通过分析文化研究中经验层次与理论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学说中，可以划分出两个互相辩证地矛盾着的层次，即文化学和文化研究。文化学属理论层次，是一般文化理论，它研究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研究，则属经验层次，它比较具体地反映、描述客体，即它是对各别的、历史上存在过的或者现存的各种丰富的文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这两者的基本关系是这样的：一方面，对文化的理论研究是经验研究的出发点和前

提，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结果。因为虽然客观对象本身是科学理论的最终决定者，但是最初的理论立场决定着对这个客体的观察方式及其中的“所见之物”，规定着主体认识客体的方法之性质。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角度看，虽然人的认识活动总是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的，但是“如果不先解决一般问题，就着手去解决个别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问题。”^①所以，理论研究会影响经验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另一方面，经验研究对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双重作用。首先，经验材料不仅预先规定着相应理论结构的内容，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这个理论结构的路标。其次，经验研究是检验在认识上可能对文化作各种解释的标准，它可以判明相应的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所以，应该把文化的理论研究同经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文化学的研究能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今天还是一门不很成熟的学科，它的范畴体系远没有成为一种有机整体，所以不要醉心于用思辨的方式去臆造一种理论体系。我想，作者的这一忠告是不无道理的。

作者肯定，与文化学中存在的理论的和经验的两个研究层次相联系，文化范畴具有科学认识的和革命变革实践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职能。前者可以指导我们认识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或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中、或同一历史类型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甚至还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同一社会系统中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后者将有助于指导我们去从事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此外，作者还提到了“文化”范畴的特殊方法论职能在于，它可以在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的各门学科之间起到中介环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充当社会科学的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之间的中介联系作用。”具体地说，它在具体的历史的研究方面，文化概念能起到一种组织经验材料的工具的作用。当然，对于这一思想，作者的阐述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充分。

总之，本书是一部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文化范畴的力作。作者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和文化范畴问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乃至哲学方法论的探讨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正是我要把此书翻译介绍给读者的根本原因。

奚洁人

1991.12.

中译本序

冯 契

Е·А·瓦维林教授和В·И·福法诺夫教授合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原名《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理论方法论观点》),是80年代苏联研究文化问题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现由奚洁人同志译成中文。我读了译稿,觉得此书把“文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进行了深入探讨,确有其特色。

苏联学者自60、70年代以来,不少人热中于文化学研究,但意见分歧,良莠不齐。本书作者试图对此作批判的总结,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原理,来探讨如何运用系统论于文化范畴的研究,把文化范畴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加以考察,深入阐明其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社会系统等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而说明文化范畴对研究价值论等的方法论意义。这些考察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时见新意,不同于那些生搬硬套、泛泛而谈的议论。所以,我以为本书是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做了一件好事。

我国近年来也有许多人热中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对文化范畴,也曾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有待于深入到文化学、哲学的层次作进一步探讨。本书作者对苏联学术界的各种分歧意见进行了分析评论,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对我国学者很有借鉴作用。当然,中国和苏联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关于文化

问题的讨论,也各有其特点,所以有借鉴作用,决不是说可以照搬。就中国而论,如何处理文化领域中的“古”和“今”、“中”和“西”的关系问题,贯串于全部近代史的各个阶段。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高涨,学术界又展开“古今、中西”之争,掀起了新的“文化热”。如何把这种学术讨论引向深入,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作批判的总结,这需要有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宽广胸怀和深邃的洞察力,也有待于客观现实条件和理论演进的成熟。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苏联学者所作的努力中,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

本书俄文原著出版于1983年。现在,政治形势已大变。但我以为,学术和理论上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不会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丧失的。前不久读了《自由思想》杂志的《致读者》一文^①(原苏联的《共产党人》改名为《自由思想》,杂志编者以非常沉痛的心情写了这篇《致读者》)。文中说:“现在清楚了,首先弃船而走的,是这条船的船长。不论这条船曾经如何,由于有千百万诚实的人,无意于任何权力、不想掌权,然而相信社会公正理想的人,才使它久航于水面。”我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这本书之后,觉得作者就是那种“诚实的人”、“相信社会公正理想的人”,他们做了诚实的工作,力求以理论和学术来增强人们的理想和信念,这种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中译本的出版,正说明了这一点。

^① 译文见《哲学译丛》1992年第一期。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言	1
 第一章 文化范畴的认识论地位	15
第一节 文化范畴研究中的具体性原则	15
第二节 文化范畴的具体特征	47
 第二章 文化范畴研究的系统论观点	71
第一节 文化范畴和社会经济形态范畴	71
第二节 文化研究和社会系统的抽象模式	97
 第三章 文化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124
第一节 文化范畴对研究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	124
第二节 经验和理论的辩证法在文化研究中的方 法论意义	154

序 言

本书主题的迫切性，首先是以不断要求更积极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先决条件的。苏共中央在党的第25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在确定苏联科学所面临的任務时，曾强调指出：“在国家发展的现阶段，进一步创造性地研究理论的要求不但不应减少，而是相反，应该不断地增加。”^①这一具有新的力量的思想，在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苏共26大的文件指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如果她不注意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不注意总结新的社会生活现象，不注意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么，她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②上述观点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

从理论上考察文化现象问题，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先是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后则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真正的体现。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肯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有传统的因素，另一方面，强调它较之以往各种文化类型更有质的更新。——关于这一点，现在，

① 《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74页。

② 《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1981年版，第77页。

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已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明。正如苏共中央在《关于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的决议》中所写的那样：“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开辟了通向精神文化财富的最广阔的道路。”^①

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实际建设成就不但没有取消对文化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相反，倒必须以此为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深刻地认识了这一过程的一般规律性，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有所发展。同时，实际活动的范围越宽广，发展理论的要求也就越紧迫。正因为如此，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深入研究“我国多方面的文化”发展^②。

学会有效运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实质上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还远没有运用各种可能性。需要努力寻找适应当前要求的新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而这些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是更加有益于多种文化的相互丰富的，可以给所有人开辟一条比我国各民族中每一种文化所能提供的更加广阔的通向美好前景的道路。”^③

指出研究文化问题与从文化学角度理解党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这一纲领性任务的要求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纲领性任务既是由党的经济战略所决定的^④，同时也表现为文化革命的目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文化的主要成份。

不把共产主义文化同一般文化概念作一对比，不在此基础上阐明共产主义文化中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也就不可能

① 1977年2月1日《真理报》。

② 《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72页。

③ Ю·В·安德罗波夫：《苏联的60年》，《共产党员》，1983年第1期，第7—8页。

④ 见《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1981年版，第136页。

理解共产主义文化。同样，对于诸社会过程作出有价值的解释，对于制定预测价值目标的诸系统来说，这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而且这对于文化建设的实践，对于解决各种各样的发展未来社会的任务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性。“按照党的第2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基本方针，放在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开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整体综合的研究，而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与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苏联人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共产主义个性的培养，即她的道德观点，对劳动的态度等方面的影响相联系的”。^①

最后，对文化概念的研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资本主义文化命运的分析水平，决定着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即反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等）的科学性，这也是对现代意识形态斗争各种挑战的直接回答。

十分明显，生活本身正在对文化理论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文化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多种文化学的原因，即内在的科学原因，这些原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文化概念的内涵及其认识论地位的明确化。文化理论中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文化的类型学或者内部成份的问题，都是文化中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问题，或者是任何一个另外的问题——一定有一个理论环节来连接它。非常清楚，所有总结各种文化学科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该问题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

总的说来，正如《哲学问题》杂志的社论指出的那样，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文化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但是在20世纪，它变成了最使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与整个旧社会的危机过程

① П. Н. 费多谢耶夫：《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和发展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哲学问题》，1981年第8期，第11页。

和新社会的发展过程相联系在一起的诸多文化现象，“使文化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①

当然，不仅哲学在研究文化问题，现代社会科学也十分注意多方面地研究文化，很难说出以某种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的专著究竟有多少。举例来说，仅仅对苏联文化的史料研究早在十年前就已发现有好几百册了^②。

而且，有关文化问题出版物的数量在各种学科当中（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人种学、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等等）增长速度特别快。这个急速的增长过程也带有不少的浪费，甚至混乱、重复，有时论证已经被证明的东西，有时则论证“现在还不能被证明的”东西。说现在出现了一股“文化学热”，并不过分。当然出现这种“文化学热”的原因不仅在于文化问题的迫切性，同时也是某种特殊的时髦心理所造成的。但是，以往的时期是一个积极的科学探索时期，积累起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材料；文化学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文化理论，它正在形成并得到蓬勃的发展。

苏联哲学家为了确定自己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他们抓紧研究作为整体系统的文化概念，不止一次地举行各种专题讨论，我们认为就文化研究的各种问题召开的座谈会^③和会议后集体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哲学问题》，1981年第1期，第17页。

② B·T·叶尔马科夫：《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苏联文化》，《哲学问题》，1973年第11期，第20页。

③ 见《文化、历史、时代》，《哲学问题》1977年第11期；1978年第1、12期。《文化—人类—哲学》，《论整体化与发展问题》，《哲学问题》，1982年第1、2期。《文化史的对象与方法》，《“苏联历史”的圆桌》，《苏联历史》，1979年第6期。《文化的社会哲学问题》，《北高加索高等学校科学中心通报》，《社会科学》，1976年第3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社会科学》，1978年第1期等。